



# 庇古、凱恩斯與羅柏森

在馬夏爾(Alfred Marshall)以後，英國劍橋大學出了三位重要的經濟學家，他們是庇古(A. C. Pigou, 1877-1959)、凱恩斯(J. M. Keynes, 1883-1946)與羅柏森(D. H. Robertson., 1890-1963)。現在就以凱恩斯為中心說明他們三人之間的關係。

先從庇古說起，他比凱恩斯年長六年，是一位英國將軍的兒子。少年時他即以成績優異獲得獎學金進入著名的哈羅(Harrow)公校，與邱吉爾同學。到1877年他又以成績優異，再獲得獎學金進入劍橋大學的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主修歷史。在校期間，成績仍極優異，先在歷史學部先得榜首，後於1901年轉入道德科學部(moral sciences tripos)，又成為榜首，當時經濟學就屬於該學部。到1902年3月被選成國王學院的院士(fellow)。凱恩斯就在這年7月進入國王學院攻讀，主修數學。當時凱恩斯在校中表現極為出色，乃為庇古所賞識，即交為朋友。

1905年凱恩斯獲得數學學位後，

不想再從事數學之高深的研究而要參加文官考試，希望將來能進入財政部服務，以求發展。由於這項考試須考經濟學，凱氏乃開始閱讀馬夏爾的「經濟學原理」，並上他的課。同時也與庇古每週同進早餐一次，期能由而從他那邊得到一些經濟學方面的啟發。這樣二人的關係自然就更為密切。（見Roy F. Harrod, *The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 Macmillan, London, 1951, p.107）後來凱恩斯在參加考試的104人中只考得第二名，這樣就不能進入財政部而只能到印度事務部服務。在這種情形之下，他也只有接受了。不過，他同時也決定要利用公餘之暇開始從事院士論文的撰寫，俾能由而獲得院士資格，以取得日後服務母校的基本條件。經二年之辛勞，他終於寫成「機率論」(A Treatise on Probability)一文，向校方提出申請，結果卻未能中選，這自然使他感到非常失望。就在這時，馬夏爾卻要聘他為經濟學部的講師，年薪一百磅。這筆款項則由馬氏自己支付。因為馬氏為培養人

張建良



才，每年都提供二百英磅，用來聘請二位青年參加教學陣營。凱恩斯在詳加考慮後就接受了。不久馬氏即告退休而由庇古繼任，庇古也仍繼續馬氏這種措施，承擔此項之支付歷數年之久。這樣自然更增彼此之間的情誼。在另一方面，凱氏竭力將其院士論文加以修改而於翌年被選為院士。自此二人都是院士，而且都被視為最優秀的院士，二人的交往自又增加了一些機會。

庇古完全皈依他老師馬夏爾的見解，認為經濟學之研究是希望能由而對人類福祉有所貢獻。因此他畢生所研究的就朝此方向去努力。到1912年就有「財富與福利」(Wealth and Welfare)一書的出版。他在序文中就提到凱恩斯對他的協助。此書之所以寫成，他曾說是由於他對失業之起因的研究而引發出來的，翌年且有「失業」專著的出版。到了1933年又有「失業理論」(Theory of Unemployment)的刊行，其中對於古典的邊際生產力學說曾有精闢的發揮。因此時凱恩斯正從事「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的著述。他認為庇古的「失業理論」是當時對古典的就業理論之唯一詳盡的敘述(見J. M.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Harcourt, Brace co, London, 1936, p.7)。但他發現這種理論「主要是假設沒有非自願失業的情況之下，研究就業數量之變動的決定因素」(見上註書, p.190)在凱恩斯看來這是不對的。同時，他認為庇古堅持工資減少可以增進就業的見解也是錯誤的。他認為工資會影響對於貨物之需要的，工資減少就會減少需要，這就會減少就業。因而就對庇古加以批評。接著庇古也予以猛烈的還擊。這在一般人看來，一定會影響二人的友誼，但事實上則不然，這種辯論並沒有在他們的私誼上產生芥蒂。(見R. F. Kahn, The Making of Keynes' General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97, 此書以後簡稱Kahn)

實際上，到了1941年，庇古在其所著「就業與均衡」(Employment



and Equilibrium)一書中，對凱恩斯所作評論的語氣就要溫和多了。他在序文中就承認凱恩斯「能提出重要的問題，實為對經濟學之重大的貢獻。」後來到了1950年，他已退休多時，還更進一步在其發表的「凱恩斯一般理論之回顧」(Keynes' General Theory: A Retrospective View)中坦承過去對凱恩斯反擊過於嚴厲，承認自己原來的見解並沒有切實掌握凱恩斯理論的真諦，在短期內高度失業水準的均衡的確是可能的。

庇古到了晚年能作如此的轉變，一方面自可看出他堅守學術誠信的性格。另一方面，我們也許可以說，就一般經濟政策論，他與凱恩斯一直就是意見相近的。例如早在1930年代早期就都反對傳統的對於公共支出不能解救失業的看法。既然如此，最後二人意見終歸於一致自亦不足為奇了。

接著我們可討論羅柏森，他比凱恩斯小七歲，是一位英國鄉村的傳教士兼小學校長的兒子。當他十二歲時就進入凱恩斯所進過的伊登

(Eton)公校，畢業後則進劍橋大學的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原來是主修古典文學的，到1910年則轉修經濟學。當時凱恩斯正被聘為該院經濟學研究中心的主任，所以羅氏就成為他第一批學生中的一員。二人的友誼就這樣建立，並奠定了以後在學術上相互協作的基礎。同時羅柏森也成為庇古的學生，受到他的影響非常之大。後來二人對於許多問題的見解就很相近。而在生活習慣上二人亦很相似，都很節儉，亦都未婚。二人的關係就一直保持非常親切。

到了1915年，羅柏森出版他第一本著作，稱為「產業波動的研究」(A Study of Industrial Fluctuations)，將歐洲大陸學人對於經濟景氣循環之造成的非貨幣因素的分析引入英國，頗獲學界重視。他因而就為三一學院聘為講師，那時他只有二十五歲。他在序文中就提到曾受到凱恩斯許多協助。後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即曾參與戰役。戰後重回劍橋以後，又於1922年出版他的「貨幣學」(Money)一書，對於經濟

張建良



景氣循環之所以造成的貨幣因素加以探討。他在該書序文中表示對凱恩斯之協助所懷的謝忱殊非筆墨所能形容。到了1926年，他又出版了第三部著作「銀行政策與價格水準」(Banking Policy and the Price Level)，將經濟景氣循環之所以造成的實質的與貨幣的因素加以綜合的探討。這時也正是凱恩斯在從事其「貨幣論」(A Treatise on Money)的著述。所以二人就此一論題所從事之討論也就更為頻繁。羅氏在該書之諸論中就指出：「我與凱恩斯先生就第五與第六兩章的主題曾作了許多次的討論，並承其指示而大量地加以改寫，所以我已分不出其中有多少是他的見解，又有多少是我的。」(見D. H. Robertson, Banking Policy and the Price Level, P. S. King, 1926 p.5)。同時，凱恩斯在他的「貨幣論」中也明確表示。羅氏那部著作對他有許多啟發，深為感銘。(見A Treatise on Money, Macmillan, London, 1930, pp. 171-172.)。

從以上的敘述中，可見他們二人

在學術探討上一直合作無間。到了1930年代初期凱恩斯在撰寫「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時自然會繼續下去。但是就在這一期間二人之間的歧見就日益增加。據當時凱恩斯之主要助手康恩(R. F. Kahn)的描述，「凱恩斯是極力設法要使他(羅柏森)能明瞭他的意思，而羅柏森則極力設法要使他(凱恩斯)能避免錯誤。」(Kahn, p.185)最後卻沒有成功，而終於步上二人友誼的破裂。那麼，二人之間所爭論的是些什麼問題呢？在這裡自無法詳述。簡單地說，羅柏森對凱恩斯所從事的短期均衡分析不以為然，同時對於他的關於儲蓄與投資的定義以及流動性的利息學說亦不能苟同。而在另一方面，當時他這些見解卻不能引起許多人的共鳴，這樣他在劍橋的處境就感到非常孤寂。到了1938年倫敦經濟學院要聘他為教授時，他也就樂予接受而揮別了一直是他學術根據地的劍橋。

現在這場爭議已經過去很久了。根據近來一些重要文獻顯示，如說他們二人的友情就此終結，則非事



實。這至少在凱恩斯方面是如此。例如羅柏森轉到倫敦經濟學院任教不到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告爆發，那時羅柏森就應聘到財政部工作。當時凱恩斯看到這種情形，就認為羅柏森可在財政部發生重大影響，提出重大貢獻。不久以後，他自己也被聘為財政大臣的顧問而到財政部服務了，二人合作機會就很多，特別是於1941年凱恩斯負責草擬戰後國際貨幣基金之方案時，他得到羅氏之協助更為眾多。唯其如此，他就常向財政部當局推崇羅氏的貢獻。同時，他在致他母親的私函中對他也備加贊許。（見Kahn, pp.186-8）再如在1944年庇古在劍橋退休時，凱恩斯與許多同仁都一致推舉羅柏森繼任。後來羅氏也就接受，而重返劍橋，一直任職到1957年退休時止。這些都顯示他們之間的友情實仍然存在，並未破裂。

不過，這場爭議對於二人的情誼也許沒有傷害，但對羅氏之學術研究的進展則發生重大影響。我們知道，羅氏是一位非常篤實的學者，

自他於年輕時發表「產業波動的研究」一書以來，一直就站在學術研究的前哨，不時在貨幣與經濟波動理論上提出一些原始性的創見。但自從凱恩斯在1936年出版他的「一般理論」以後，他就再也沒有在這方面有任何重要的創作的刊出。何以致此？他曾坦承這是受凱恩斯的影響。他說自從凱氏這部著作出版以後，他的特殊任務就只能對其中的細節加以闡釋與批評。「我太老了，太懶惰了！就算我還年輕，不懶惰，我想歷史已經註定（要我再對貨幣理論或波動理論有嶄新的綜合式發揮）是不可能的了。…這是凱恩斯的勝利。…」（見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Macmillan, London, 1987, p.210）果爾，這就不能不說是經濟學上一大損失。☹